

王云杉、张鑫、蒋洪利、梁爽4人正在讨论中

《装台》：打开人性书写的新空间——兼及同名电视剧的讨论



云友读书会

有书友自“云”中来，不亦乐乎？云友读书会成立于2020年5月，是中国作家网在疫情中联络策划的线上跨校青年交流方式。此读书会面向热爱文学的青年，通过线上学术沙龙、读书分享、主题演讲等活动，推动青年学人的文化与学术交流，力求以文会友，激荡思想。云上时光，吾谁与归？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

生活如麻，真善美似光

王云杉：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词中指出：“人是不朽的，并非因为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与《水在时间之下》《主角》等借主人公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展现人物顽强、坚韧特质的作品不同，《装台》让顺子一伙舞台背后的工作人员成为“主角”，并借顺子等“打工人”在社会生活中展现出的善良、宽容、仗义、乐观、豁达等人性优点，引导读者朝向“真、善、美”，具有社会与个体的启蒙价值。《装台》正是从小人物出发，发掘着人类所拥有的一切美好品质，在人性书写方面打开了新的空间。

张鑫：在《装台》诸多人物形象中，顺子的人格是比较复杂的。他身上始终闪耀着真善美的光辉，透着不服输的韧劲，同时他身上还有阿Q的影子。顺子解释他冬夜看菜地时为何异常耐寒时说：“人哪，只要心里不觉得冷，身子也就不咋冷了。”猴子说他这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以往人们提到阿Q总带着贬义，倒是猴子提醒了我，精神胜利法有时也可以成为支撑人活下去，鼓舞人不屈服的法宝。人们在新世纪理解阿Q及阿Q型人物时，可能需要更加多维的人性视野。

蒋洪利：顺子的形象，从某种角度上说，他是当代人生活状态的剪辑与缩影，他身上凝缩着中国人特有的坚韧精神、责任意识与乐观态度。故事主要借他与妻女的生活关系、与装台人的工作状态来表现他顽强面对生活的种种打击、处理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也正是在他努力寻求照顾好菊花、韩梅、素芬、周桂荣以及装台汉子的过程中，一种作为父亲、丈夫、工头的责任意识得到深刻展现。面对一团乱麻的生活窘境，顺子从没见过放弃，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顺子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斗志和积极乐观的态度，生活的琐碎非但没有将他打垮，反而将他磨砺得更加“锋利”。这样的形象彰显出的时代精神感染了众多读者，使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暂时忘记了小人物的悲哀，转而从中汲取到了勇敢面向生活的力量与激情。

梁爽：小说里“装台人们”的戏在台下。台上的主角成了配角，不起眼的装台人成了主角。然而，他们却是困在装台的上下左右的活动空间中的被

“遥控”的人，只能兢兢业业、坚韧不拔的受活。刁顺子虽然一生不顺，但生命中的磨难并没有磨平他内心的善，反使他更能体察人情中的温热冷暖。顺子的一生像是被人推着走的，他总是承担着一个个接受者的功能。为了装台这份工作，点头哈腰、低声下气、被嬉笑谩骂已成为顺子生活中的一部分。诚然，顺子的性格中有懦弱的一面，但是当他身上背着全队生计的时候，肩上的责任迫使他不得不忍气吞声，其中还多了一份韧性的坚守。此外，顺子在家庭空间结构中是一个缺口的存在，比如顺子很多次回家都是家里出事才匆匆忙忙赶回来。对于顺子来说，“家”的功能或许在装台的公共工作空间中找到了替补的位置。

刁菊花的变态与悲哀

王云杉：刁菊花形象的复杂性，增加小说的伦理价值，引起人们反思与父母、兄弟姐妹、同学朋友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纵观整部小说，菊花与父亲顺子、继母蔡素芬、妹妹韩梅处于水火不容的对峙关系。然而，从小说的几个细节来看，菊花与家庭成员亲密关系的转变过程，颇为微妙。菊花与顺子的亲情疏远，始于韩梅从高中升入大学的那段时期。在菊花看来，顺子资助韩梅升学读书，无形中转移了自己“应得”的父爱。由此，菊花将生活中的挫败、失意和不满，归因于顺子低下的“装台人”身份。同时，菊花总是用生母的目光，观察继母蔡素芬的一举一动。童年时期的菊花听闻生母遭受“烂货”的指责，此后，又将这种声音“移植”到继母身上，称她“骚货”。所以，菊花三番五次地向顺子索要生活费却毫无感恩之心。从菊花与父母的关系来看，中国式子女过度的占有欲和“拒绝长大”的童年情结，是影响家庭亲子关系的重要因素。

梁爽：在作者笔下，菊花是“恶”的存在，可以说她是一个“反成长”的人物，她对于外界始终处于一种敌意的紧绷状态。菊花在小说中没有遵循社会既定的发展成长模式，也没有在成长的经历中汲取力量，从而获取内心的成熟与精神的满足。在小说的最后一节有这样一句话：“菊花一还巢”，过去那音乐就又响起来了，声音一样，节奏一样，叫声一样，是那种永不安生的怪叫声，就是不像唱，只那样一直没头没尾地反复着。”过去时态的音乐在菊花几次离家——归家后反复响起，即使在菊花虐杀狗和自杀未遂、结婚整容之后，菊花的主体地位也并

没有真正被确立起来，咿咿呀呀的音乐隐喻着菊花重复着无聊的生活，菊花的成长表现为一种停滞的、不成熟的状态。包括整本小说可以说是一种循环式的，结尾菊花回到家后，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开头的情节，顺子家带回来一个女人……

张鑫：的确，小说中菊花变态心理的根源值得分析。菊花快30岁时的那次露水情缘，虽算不上其心理畸变的根源，但可称得上是她加速变态的拐点。到装台队“下苦”挣钱的陕北小伙树生，黑灯瞎火和菊花发生关系，到了白天一睹她真容后，连工钱都没要就偷偷溜走了。在这里，菊花容颜一见光（即使化了妆），便让温柔肉体、省城房产、装台队“老板”千金身份等资本瞬间失效，即使二者的结合能让树生“少奋斗十几年”，他也不要，甚至不惜赔上工钱。这对菊花的打击不可谓不巨大。

蒋洪利：菊花这个人物为故事注入了强大的戏剧性与冲击力。菊花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性。她以刁大军为榜样，与乌格格做朋友都是想借此改变自身的身份与地位，以获得一种社会认同。毕竟她在学习上比不上韩梅、在相貌上不及一般女性，外加她还有一个较为“卑微”的出身以及较为“悲惨”的童年……当这一切从负面施压时，她只能从物质层面寻求满足。然而残酷的现实不断消解着她的期待与幻想，她以不同的方式报复着父亲与继母，而当谭道贵带着她去韩国整容时，她重获自信。然而美容失败回归后看到父亲又找了一位继母，她便再次跌入“轮回”的深渊，变得暴躁且“变态”。可以说，正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菊花不断失掉了人性与自我。

电视剧《装台》的微妙细节

王云杉：电视剧在人物关系、情节安排、故事氛围等方面，都与原著小说存在显著的区别，可以称为一部“再创造”的作品。从总体上看，电视剧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意蕴。在小说中，顺子等人在搭台、装灯的过程中，时常被刁大师、靳导，以及其他人员要求“返工”，他们强忍身体和心灵上的劳累和痛苦，却不得不表现出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而在电视剧中，顺子异常辛苦的工作状态被一笔带过，观众最多只能从顺子一伙住宿剧场的画面，猜想他们奔波劳苦的生活状态。同时，顺子在恳求瞿团、铁寇帮忙办事的过程中，其老谋深算的心计和百感交集的心理情绪，被电视屏幕做了简单化的

陶兆基、赵鼎、高瑞晗、李泳凝、于明玉5人正在讨论中

《大山里的小诗人》：翻山越岭的希望之光

诗·陶兆基

谈及诗歌创作、诗歌评论，存在的视角似乎是长久割裂的。就文学研究者来说，学院化的理论话语与批评实践几乎垄断了一切：细读、意象的择取、隐喻的解剖以及一切语文学与音位学上的分析，诗歌成为了“精致的瓮”，就大众来说，诗歌或成为媚俗、量产的装饰品，或成为戏谑的对象——尤其是处境尴尬的现代诗。

现代诗歌何为？在专业诗人的“经验”之外，《大山里的小诗人》确立了另外路径：浑然天成的真善美。《接月亮》的时候，跑步的星星撞倒了月亮，下坠的月亮“刚好落在我手上”，“从此我手上有月光”；《黑夜》中，“我信奉黑夜”是由于它像爱一样能覆盖一切；《蜗牛》里，蜗牛“天天背着它的小屋”的原因是它太调皮，“所以它妈妈才不让他回家睡觉”。留守儿童化为诗句的心声令人感伤：“我把装在瓶子的思念/放在高高的山顶上/变成了黑夜的眼睛”；“大鸟飞去远方/小树慢慢长大/等大鸟回来了/小树给它一个家”。

康瑜与志愿者们传递诗歌理念的同时，惊讶地发现，或调皮、或寡言的孩子们，竟都能在诗歌里埋设丰富细致的联想与感知。稚嫩衬托出技巧之外触动人心的真挚感情和独特视角。这本诗集见证了天真的感性在诗歌启蒙下渐次绽放出纯洁的花朵。

都市人似乎多不屑于触碰诗歌，而是勒令孩子攻克奥数、少儿编程甚至科创项目。诗歌向来“无用”，无法消除苦难与贫困，但却能在孩子心底埋下善良与美好的种子，并提供想象力的启蒙。我始终坚信，这是为人更重要的一部分品质。

星光·赵鼎

大抵是常年生活在乡村山林中的缘故，诗集中绝大部分诗歌的意象都与乡村自然景物和日常琐事密切相关，但即使是最普通不过的事物，一旦经过孩子的幻想加工，也会随之变得新鲜灵动。在《婚礼》中，小诗人将黑板和粉笔分别比作身着黑礼服的新郎与穿着白婚纱的新娘，簌簌掉落的粉笔末就是他们的孩子；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浪拍沙滩在《海浪》里是母亲偷偷亲吻着孩子的脸颊；天空中降下的雨水是乌云与白云结婚时撒下的喜糖，星星在水中的倒影则是满天星河流淌汇入凡世的河水之中……在小诗人的眼里，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能确立一个浪漫奇妙的解释，他们以诗意的笔触描摹自然、吟咏生命、叙写生活。在感叹小诗人为我们带来阔别已久的清新与童趣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

现，诗集中许多作品都被一层朦胧的悲伤气息所萦绕，徘徊于天真烂漫的幻想与残酷破碎的现实之间。

“星星”似乎颇受小诗人青睐。在他们笔下，星星是生活中常见事物的幻想性投射：它们是饼上的芝麻、是天空中撒下的黄澄澄的玉米、是“超人打碎了月亮钱罐”后撒满天空的金色硬币、是调皮地跌了一跤的孩子；还有一些小诗人则将星星看作将自己与神秘莫测的大自然联结在一起的暗夜精灵，它们“不小心将月亮撞下来”，月亮落在“我”的手心，“从此我手上/有了月光”。闪烁璀璨的繁星寄托着他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与对自然的无尽神往。星星是光明温暖又活泼可爱的存在，但在另一部分诗中，星星似乎始终浸染着一层挥之不去的忧愁。父母离异的孩子说，星星是“天空的眼泪”，她对双亲无尽的思念只能通过走路的方式稍作纾解，因为“走着走着就累了/想着想着就忘了”；母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则将星星比作“妈妈的眼睛”，孩子凝望着星空，星空俯瞰着孩子，仿佛母子之间无声的对话。再美好的想象也无法改变“我在家乡/妈妈却在远方”的事实，无法消解孩子对母亲的想念。星星是思念的代名词，孩子们把昔日的幸福回忆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悉数付与星星。事实上，在小诗人的世界里，星星的意蕴早已超出自然景物的边界，孩子们难以宣泄的苦闷和无处安放的情感在自然与诗歌的互动中找到了心灵依偎与精神寄托。星星不只作为单纯的文学意象而停留在他们的纸上，更成为他们调节现实与梦想、联结生活与想象的心理枢纽，赋予了他们继续前行的勇气与希望。

托尔斯泰曾经这样形容诗歌，它是一团火，在人的灵魂里燃烧。这火燃烧着，发热发光。小作者或许无法直接依靠诗歌走出深山、摆脱贫苦，但是，诗歌调动的心灵成长与美的启迪却是明晰而持久的，它可以在漫长岁月里实时温暖人心。

黑夜·高瑞晗

孩子有着无邪的思想和纯真的心灵，所见所感的万物都是充满灵性的。山里的孩子与自然朝夕相处，他们的想象力在自然中孕育，将宇宙、太阳月亮、雨露花草写进诗里。星星、月亮、云朵、小河、大树，甚至是面团和脚下的路，都可以触发灵感。他们笔下自然倾泻的诗句，在心灵疲惫的都市成年人看来，是那么自然美好。

孩子虽然都会烦恼、会孤独、会生闷气，大山里的小诗人却面临着额外的困境。他们中很多人是留守儿童，被迫从人生的始发站开始学习独处。虽然心中留下了孤独的刻痕，但他们依然相信爱，相

信希望。

诗中经常出现与黑夜有关的意象。孩子们对黑夜极其敏感，当寂静深沉的夜色笼罩大地，小诗人开始进入另一个世界。“黑夜”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体。相对于白天的喧嚣，夜收纳世界的宁静。小诗人眼里的星星像芝麻、像硬币；月亮像汤圆、像月饼、像储钱罐，它们都是带有情感的生命体，成为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

夜晚同样也是孩子逃避现实的理想领地。13岁的小诗人于姜“在梦里”铺开一片美妙梦境，“干瘪的种子开出了美丽的花，顽皮的孩子没有迷路，也找到了家。她呀，依旧站在花旁，亲切地喊着我的名字，说：‘孩子以后早点回家’，我扑入她温暖的怀抱。睁开眼，美丽的花结出了新种子，孩子听话早早回了家。她呢？去哪了？”被迫过早面对亲人的离去，作者在学习坚强。

“我觉得那些爱无处不在，就像夜晚一样静谧、温馨，让人沉醉梦乡”。孩子的世界里，一切情感都是素朴的。对黑夜的想象，实质是留守儿童对忧伤、孤独的一次逃离。

山·李泳凝

“留守”是一种割裂和停滞。《大山里的小诗人》冲破拘囿，抹去了概念引导的痕迹，以孩童之眼观察自然之心感受乡村。

大山是文学作品中常驻的空间意象。诗集里，山却化身为孩子们平等的谈心对象：“大山你一直站在那里/你不觉得累吗/如果是我/我就不会一直站在一个地方”。

“山/有许多动物陪伴/而我/却只有/沉默”，大山里的孩子用智慧遮掩孤独。他们收藏着伤感，但笔下鲜有怨怒，因为与父母相隔已成为群体共性。成长中珍贵的自我剖白无法跨越群山，在人与物的挤压下，孩子们只能将其诉说与“阻挡者”。倘若山的心事能被解读，我们就能明晰一个孩子的成长：起初将“快乐作为树苗”，最终将“思念丢到山上”。“阻挡者”成为“接收者”，层叠山峦无声矗立，成为孩子情感的忠诚依托。

小诗人们怀揣着“飞到山顶看世界”的热望。在“山”意象的背后，是地域对个人梦想的浸染和干预。代生生死于斯的祖辈故事，令山一方面被固化为命运运的牢笼，另一方面被拟人化为倾诉心声的情感伙伴。山所投射的地域映像，是万家炊烟和纯净泥土，是人生围猎中深埋的个人情志。山与人之间，是互相依恋、互相阻隔、互相成就的关系。山勾勒孩子们在故乡的梦，他们携带着希望之光与梦想之火在翻山越岭。

布罗茨基说：“艺术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尝试，

相反，它是一种赋予现实以生气的尝试。”诚然，诗歌无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它却能带给孩子们一条明确的“我能做”以及“我想要”的道路。“我想/如果我会飞/和一座山问好”，纵使行疆万里，山依然在。

求哺·于明玉

在“为儿童写的诗”转变为“孩子的诗”的过程中，所更变的并非仅仅是写作技巧的纯熟运用和书写思维的缜密建构，更是成人意志的剥离和心理需求的直抒。当刻意还原纯真叙事的有意识创作成为刚需，定会增加文字沉潜的厚重感，同时也将削减天性使然的审美力量。以孩童为创作主体的诗歌，无意拓展语言的深度，却体现出渴求倾诉的紧迫感。正因如此，诗集并不盘桓于用词和结构的斟酌，而是通过对个人本真的心灵写照，呈现出较为天然的诗意。诗歌中，失衡的外部环境与谨慎的自我感知并存，这恰是留守儿童早熟于同龄人的独立体验。

作品不乏对世界样态的朴素理解以及天马行空的简单描摹，但亦存在着大量交融自我的个人言说，流露出难以从外部窥视的情感体验。“求哺”是其沟通欲求书面化的呈现。亲子关系突然中断造成的打击，往往使孩子失去打破疏离的主动性，由此引发对父母之爱的迷茫。

诗歌将求哺之欲重新点燃。在向雅捷的《秘密》中，她写道：“有一只大肚子鸟/它的肚子很大很大/因为它把很多想说的话/都憋在肚子里。”与众固有印象相反，他们并不缺少“我是母亲的孩子”的认知，而是过早地被置于求取双亲陪伴与理解父母远行的两端，因此在挣扎中逐渐失声，进而将自然之物幻化为父母，吐露“美好的事物皆是你”的诉说。

施应锁小诗：“我在爸爸妈妈看不到的地方，偷偷长大。”这是大山孩子寂寞成长的真实写照。陪伴缺席的另一面必然是沉默，当“看不到”与“找不到”成为常态，孩子们自然会回归隐忍的自我拔节。但需要注意的是，孤独与快乐并不冲突。相对质朴的生活需求，使得他们更专心于对人间真情与纯洁万物的开掘，迸发出无可比拟的“向光性”。

乡村孩子的诗歌具有明显叙事倾向，包裹着对普通生活场景的诗化书写和对情感片段的具象凝滞，为读者还原感同身受的拟真环境，从而跳脱“美感的态度”，建立沉入灵魂的主客体交流。当父母从远方归来，他们或许一时相对无言，而诗记录下隐忍的苦痛与馥郁的思念：只有“我”的童年，“我”多么渴望你们的怀抱。



“和光读书会”本期选择了一部儿童公益诗歌集——《大山里的小诗人》，作者是来自全国各地山村小学的孩子。公益机构“是光诗歌”走进中国数百所乡村中小学，让几万名孩子体验了人生中第一堂诗歌课。《大山里的小诗人》承载着无数儿童做过的梦和想做的梦，跃动的童心诗情是我们曾经失落过的，也是我们现在仍需要的。正如“是光”创始人康瑜所说，诗歌的力量有限，但美好可以在孩子们心中扎根并传递。诗集入选2020年豆瓣年度榜单·中国文学（非小说类）。“和光”里“90后”与“00后”的五位朋友，愿引用锡德尼为诗歌的辩护：诗在一切人所共知的民族语言里，曾是最初的光明给予者，是懂懂者最初的保姆。

